

## 赣语小称儿尾词“伢”(li)之音韵溯源<sup>①</sup> ——兼论汉语儿化音的历史层次与类型分布

张民权

中国传媒大学

汉语儿化词尾的读音在各方言中有不同的表现，赣方言名词小称儿尾“伢”就是其中一种。本文从“儿”音史的研究出发，考察了“儿”音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南北方言中的读音表现，归纳了汉语儿化音的五种类型，论证了赣语名词后缀“伢”的儿尾性质，它属于边音型儿化音系列，其历史层次则为宋代官话“儿”音的历史遗留。从赣语儿尾“伢”的分布状态看，它实际上成为区别赣语与否的一个重要特征。“伢”的儿尾性质及其历史层次的揭示，是本文对赣方言研究的一大贡献。

### 一 问题的提出

“儿”和“子”是现代汉语中两个非常活跃的名词后缀形式，诸如花儿、瓶儿、盒子、盖子之类。就语音的历史变化而言，“子”在南北各地方言中音变形式不是很大，但“儿”尾音读差异却非常大，有的甚至根本看不出其后是个“儿”尾形式，如赣方言的“伢”（一般读 li）就是如此，“雀伢”其实就是“雀儿”，即普通话的鸟儿之意（今宜春、南城、余干等地区仍然叫“鸟伢”，详见下文）。

然而，很多研究赣方言的著作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儿”尾性质，只是把它视为与“子”相同的词尾形式。如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陈昌仪先生的《赣方言概要》及后来主编的《江西省方言志》、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等，都未曾涉及其语音实质问题。《汉语方言概要》赣语部分举了南昌话的“子”和宜春话的“立”作为两个常用词尾形式加以讨论（如茄立、鞋立、

---

<sup>①</sup> 本文曾先后在第二届赣方言学术研讨会（2009 南昌大学）和第十八届国际中国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2010 哈佛大学），略有修改和补充。会上，王福堂、邢向东、孙景涛等专家学者多有赐教，另外，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其中一些意见本文修改时虽未能完全采纳，但于本人研究多有启发，在此深表谢忱。

麻雀鸟立，第 142 页），其音韵来源问题却没有论及，且认为南昌话没有“儿”尾。《方言志》虽然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名词词尾“子”“伢”及其变化形式（第 11-12 页），而历史来源却未加以解释。

论文方面，熊正辉先生早年发表的《南昌方言的子尾》一文（《方言》1979 年第 3 期），只讨论了“子”尾的分布及其用法问题，没有涉及“伢”的词尾性质及其音读问题。后来谢留文先生发表《南昌县（蒋巷）方言中的“子”尾和“里”尾》（《方言》1991 年第 2 期），全面讨论和描写了“子”“里”的用法，但就“里”的语音来源问题也未能加以讨论。“里”（li，轻读）即本文所说的“伢”，但该文所描写的形容词加“里”的形式，却不属于小称儿化词范围，如：衣服穿得厚厚里，跑得快快里，等等。此“里”为“子”或“的”的音变互用形式。或认为轻读的“里”相当于词尾“子”“儿”，如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辞典》第二卷“里”（li）字条：

词后缀，放在物品名词之后，相当于“子”“儿”，(一)赣语。江西永修[li°]桌~|裤~。  
(二)客话。广东五华：刀~刀子|细人~小孩儿。（第 2682 页）

其实它就是“儿”尾，不是“相当”的问题。尽管上述文献有多种书写形式：“立”、“伢”、“里”，或写成“哩”（《调查报告》记为“哩”），但其实都是“儿尾”音读的借音标记，只是因为今之赣语“儿”字读音[ə]（熊正辉先生拟作[ə]，音色相近），与[li]音相距甚远，才掩盖了其历史真正面目。本文遵从陈昌仪先生的研究，使用“伢”代替其它书写形式，并试从其语音史及其语言类型分布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 二 判断赣语“伢”为儿尾音的语音依据

考“儿”字之历史音变，其变化形式最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南北两系：北方官话区大部分由《中原音韵》的支思韵[z<sub>ɿ</sub> i]（ɿ, ʅ）演变为儿化韵 əɾ（[ə̯]）。南方方言区则保留了更古老的语音痕迹，以鼻音[nɿ]为主。依本人研究，其祖音应当是隋唐时期的卷舌鼻音[n<sub>ɿ</sub>ie]或闪音[ɾie]。自宋元之后，“儿”字才在北方官话区发展为卷舌边音[lɿ]和[zɿ]，今天在北方官话区的一些次方言区域内“儿”字读音仍是如此。声纽[n]、[ɾ]、[l]都是舌尖后音，音色非常相近，因此，儿尾词的读音在南方方言中就有可能朝着两个方向演变，一系是鼻音化声母，如吴语儿尾形式：ŋɿ 或 nɿ（如南部吴语），一系则由 [ɿ] 变为 li，如赣方言区。由于赣方言没有卷舌音即舌尖后音，故今普通话声母读 r 的字（绝大部分为中古日母字）很少读成 z<sub>ɿ</sub>-，要么读 n<sub>ɿ</sub>-（细音前）或 n-（洪音前），要么读 l-，如南昌话把太阳说成“日头”[n<sub>ɿ</sub>it<sub>5</sub> t<sub>5</sub>əu]，瓜瓢读成[kua<sub>5</sub> laŋ]，少数中古为喻母而普通话读 r- 的字仍读零声母，如“容易”读

成[ $\text{t͡sion} \text{ i}$ ]。所以赣语中的“雀伢”应当是“雀儿”的儿化词形式，它是历史语音的遗留。

赣方言没有儿化韵，普通话读[ə]的词如“儿耳二贰”等单念时只读[ə]（音位变体有 e、ε、o 等），后面没有卷舌动作。另外，在南昌话中，少数中古日母遇摄字如“如儒乳”等也读[ə]，如街道“孺子路”，老年人一般念成[ $\text{ə} \cdot \text{tsɿ} \text{ 1u}$ ]，只有年轻人才按照普通话的读音念读。许多名字听起来像“国儿”“保儿”的，其实都是“国如”“保如”的念读。于是，有些中小学生或教师由于不明其音读关系，则直接将名字“国如”写成“国儿”。但作为儿化词形式的“雀儿”之“儿”，却没有按照[ə]音读，而是念成了“雀伢”或“鸟伢”。它保留着更古老的历史语音层次，而单念[ə]者则因为近代以来受官话音的影响所致。

### 三 儿尾“伢”在省境内的分布状态

与普通话一样，赣方言名词词尾“子”“儿”（“伢”）的用法非常活跃，一般情况下，表示物件或动物鸟类等单音节词都可以后缀“子”或“伢”，下面以南昌话为例：

(1) 一子：刀子、凳子、柜子、板子、棍子、镜子、包子、钩子、叉子、锤子、锯子、桔子、柚子、格子（窗子，过去农村房屋窗户均由木条格子组成），等等；

(2) 一伢（儿）：裤伢、褂伢、裙伢、鞋伢、带伢、雀伢、鸽伢、珠伢、梳伢、帚伢、树丫伢、竹伢、崽伢、猪牯伢、星伢、影伢、痨病壳伢（有肺病的人，有时为骂詈之语），丝伢（如头发丝伢）、蚊伢、蝇伢（苍蝇），等等；

有时人名也可以儿化表示亲昵或爱称，如名字为“根宝”可以叫“根伢”，女孩名称“淑华”“国华”之类的可以叫“华伢”。在普通话的影响下，“伢”的使用范围不如“子”，且有萎缩之势，城里青年人一般说“子”。上述裤伢、褂伢、裙伢、鞋伢、雀伢、鸽伢之类都可以换成裤子、褂子、裙子、鞋子、雀子、鸽子，等等。但一些以“子”作后缀的词一般不说成“伢”，如凳子、柜子、板子、锤子、锯子、格子等一般不以“伢”后缀，只有桌子才一般可叫“桌伢”；同时“丝伢”“蝇伢”之类也不可换成“子”尾。

“子”在一部分地区音变叫“得”，如南昌县河头乡就是如此，如凳得、柜得、板得、锤得、锯得、格得，等等，在省境内其它县市区也多以“得”作名词后缀。

下面以普通话“鸟儿”为例，详细列写省境内各个县区的读音情况，从中可以考察儿尾“伢”的分布范围。材料取自《江西省方言志》（原书第 506-507 页）。

张：赣语小称

星子	鸟 tieu	金溪	鸟 tiau	高安	雀子 tieu . tsu	崇义	鸟儿 tio . le
都昌	鸟得 tieu . ε	崇仁	鸟伢 tio? . li	宜丰	鸟仔 tieu . tci	上犹	鸟儿 tiau . le
武宁	鸟子 tiau . sɿ	宜黄	鸟伢 tiau . li	上高	鸟崽 tieu . tse	于都	鸟子 tio tsɿ
安义	鸟 n̩ieu	乐安	雀崽 tciɔ? . tɔi	万载	鸟得 tiau . te	兴国	鸟伢 tiau li
新建	雀仔 tɕ <sup>h</sup> io? . tci	南城	鸟伢 tiau . li	丰城	□□仔 pa <sup>3</sup> pa <sup>0</sup> . tci	宁都	鸟子 tiau . tsə
南昌	雀子 tɕ <sup>h</sup> io? . tsɿ	黎川	鸟伢 tiau . i	樟树	鸟仔 tieu . tci	瑞金	鸟子 tio . tsɿ
彭泽	鸟 tiau	南丰	雀伢 tciɔ? . li	新干	鸟崽 tiau . tse	石城	鸟子 tiau . tsɿ
波阳	鸟 n̩iau	广昌	鸟 tio?	峡江	鸟得 tiau . te	九江	鸟儿 n̩iəur
乐平	鸟 tieu	永丰	鸟得 tieu . te	新余	鸟得 tieu . te	瑞昌	鸟 niy
万年	鸟伢 tieu . li	吉安	鸟伢 tiau . li	分宜	鸟得 tieu . te	上饶	鸟 tio
余干	鸟伢 tieu . li	泰和	鸟伢 tiau . li	宜春	鸟伢 tiəu . li	玉山	鸟儿 tieu . ni
横峰	鸟 tiau	安福	鸟 tiau ↗	萍乡	鸟仔 tiau . tci	广丰	鸟 tieu
铅山	鸟 tiau	永新	鸟伢 tio . li	定南	鸟儿 tiəu . uə	婺源	鸟 liou
贵溪	鸟伢 iau . li	莲花	鸟仔 tiau . tci	龙南	鸟得 iau . ε	德兴	鸟 tio
余江	鸟伢 tiau . li	遂川	鸟伢 tiau . li	寻乌	鸟子 tiau . tsɿ	浮梁	雀儿 tsien
进贤	鸟崽 tieu tci	万安	鸟儿 tiau . le	会昌	鸟崽 tio tsei	赣州	鸟子 tio . tsɿ
东乡	鸟伢 tieu . li	靖安	雀伢 tɕ <sup>h</sup> io? . li	大余	鸟儿 tio . læ		
临川	鸟崽 tieu tsei	奉新	雀伢 tciɔ? . li	南康	鸟子 tio te		

说明：上表所列 70 个县区“鸟”的称名，笔者限于足迹，未能一一核实，但大部分可以感知。笔者母语为南昌话，在后来工作和生活中与周围很多县区的人有所接触。只是其中有些“子”缀的地区仍可读“伢”，如南昌、新建、安义大部分地区读“雀伢”。然而，即使是同一个县区内，其名称或读音也有差异，描写只能就大体而言，因此，其间可能有少些参差，但基本数据可信。

从上表所列“鸟儿”称名中，可以看出如下几个特点：

1、“鸟”字声母绝大部分地区读舌音[t]，还保持中古时期都了切（《广韵》）的读音，只有极少数地区读[n̩]（《洪武正韵》之后读尼了切），这是客赣方言的基本特点；

2、除了 15 类单名“鸟”外，其余 55 例都有后缀词，或为“伢”（儿），共 26 例；或为“子”和“得”“崽”等，共 29 例。从中可见“伢”和“子”的互用

问题，同时也可以说明“伢”的萎缩性。其中“仔”“得”“崽”等都是“子”音的讹变。

3、在以“伢”作后缀的26例词语的读音中，大部分读[li]，少数读[lə]，如崇义、上犹二县，个别地区声母弱化，读[i]，如黎川县。<sup>①</sup>这是主流。此外，受官话影响，九江地区则为卷舌儿化韵，且儿尾不能自成音节，“鸟儿”念成[niɔ̃ur]；<sup>②</sup>其次是受吴语或徽语影响，赣东北地区的玉山、浮梁等县儿化后韵尾成-n或自成音节[ni]，<sup>③</sup>如横峰话“毛伢儿”读成[mau<sup>33</sup>ŋa<sup>44</sup>ni]。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儿化词尾“伢”的音读形式是赣语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区别赣方言与否的一个重要特征，<sup>④</sup>并由此可以考察其与省境外周边地域及其方言的关系，如与客家方言、湘方言、吴方言或徽语及江淮官话的关系。

#### 四 “儿”音的历史发展及现代汉语儿化音的历史层次

为了进一步弄清赣方言儿化音的语音性质，我们有必要运用历史比较法原理，就现代汉语儿化音的历史发展作一番探讨，并从现代汉语南北各地方言儿化音的语音类型分布上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以印证赣方言儿化词尾“伢”的历史语音遗留问题。

然而，探讨“儿”字的历史音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高本汉曾言：“拟测古代汉语的声母系统，日母是最危险的暗礁。”<sup>⑤</sup>属于日母的“儿”字更甚于此。尽管许多前辈学者及其时贤在这方面开掘甚多，成绩可嘉，但其中有些问题仍未能解释清楚。随着近年来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深入，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我们必须辨析清楚这样几个概念：儿化词、儿化韵、儿化音。

儿化词不等于儿化韵，儿化词是汉语词汇双音化的产物。根据诸多学者的研究，自汉魏以后，具有小称意义的儿化词开始出现，如《史记·外戚列传》有“臧儿”（景帝王皇后之母亲），《汉书·王莽传》有“卖饼儿”，以表示人名或职业身份，带有贱称之色彩。经历南北朝至唐宋之后，儿化词已经是个非常普遍的词汇现象，

<sup>①</sup> 黎川方言儿尾i在前一个韵母辅音后会产生相应的鼻音儿化，如“燕儿”[iɛn ni]，“影儿”[i aŋ ŋi]，参见颜森《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方言》1989年第1期。

<sup>②</sup> 在鼻音后作ne，如棍儿kun<sup>41</sup>ne。参见张林林《九江话里的儿化现象和儿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sup>③</sup> 广丰话儿尾亦读[ni]，当地人一般写作“闾”。参见胡松柏《广丰方言的“儿”尾》，上饶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sup>④</sup> 会后有专家对此有异议，因为至今没有哪个方言学著作提出过类似观点。我想，只要认真地审视上文图表内容乃至《江西省方言志》中所有名词词尾形式，你一定会同意本文所提出的观点。

<sup>⑤</sup>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第338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3月（赵元任等译）

由开始的人名可以泛称鸟兽草木鱼乃至生活用品等物什，沿用至今。但儿化韵——也就是现在北京话的卷舌元音[ɤ]——产生的年代则很晚，根据李思敬、薛凤生、鲁允中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大致是在明代中期。因此，在很多方言中，都有表示小称的儿化词，但不等于就有儿化韵。儿化音则是指儿化词的儿尾音读及其在后来方言中的音变形式，因此，儿化韵[ɤ]只是儿化音中的一种音变形式。在今天的南方方言中，虽然没有儿化韵，但不等于没有儿化音，只是它的尾音与今日所谓的儿化韵不同而已，而赣语的名词后缀“伢”(li)就是其中一种。显然，如果把汉语儿化音局限于北京话的儿化韵，在认知上是有缺陷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很多方言学者严格区分“儿尾”与“儿化”一对概念，所谓能够自成音节者为“儿尾”，不能自成音节而能引起音变的为“儿化”。然而，在很多方言里，有的既能够做“儿尾”又能发生音变，所谓“儿化”，两者往往难以区分。实际上，“儿化”只是“儿尾”音变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北京的“儿化”词里，老年人“儿”音ər仍可自成音节，“花儿”[xuar]可以说成[xua əɾ]。又如梅县客家话儿尾为e，自成音节，但在前面韵母尾音的影响下，可以发音成诸如ne、me、ŋe、pe之类。因此本文从语音史出发，把名词儿尾的读音及其在方言中的演变均称为“儿化音”，<sup>①</sup>以便于行文表述，同时又与“儿化韵”相对区别开来。

根据我们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和现代方言学的成果，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方言中的各种儿化音形式，其元音应当是隋唐时期的[ŋje]或闪音[ɽje]，<sup>②</sup>也就是说，《切韵》时代“儿”字读音是[ŋje]（支韵），后来随着《切韵》支、脂、之三韵合流，则变为[ŋj]，大致在唐五代之后发展为[nj]和[ɽj]。<sup>③</sup> [nj]可能是早期语音状态，[ɽj]有可能是后来的语音蜕变。随着后来北方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早期形态的儿音朝两个方向发展：[nj]音系发展为南部吴语的鼻音形式ŋj或ni（大部分客家话也是如此），[ɽj]在当时的北方官话区则演变为[lj]，其演变完成时间大致是在宋金时期，ɽ为闪音，类似卷舌边音ɭ，在某种意义上ɭ是ɽ的音位变体。今天山东莱芜、河北武安、井陘、山西祁县和西南官话中的遵义等地方言中“儿”读[lj]者（作儿尾时有

<sup>①</sup> 邢向东和孙景涛先生建议是否可改为“儿尾音”，可以接受。但本文使用的“儿化音”是因承词汇意义的儿化词说的，因此在行文中有时又直接以“儿尾音”称之。

<sup>②</sup> 这种拟音也许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因为有学者可能会提出质疑：[ŋje]或[ɽje]都具有舌尖后卷舌性质，《切韵》时代有没有舌尖后声母，值得怀疑，从语音系统上看，齿音照组系列还没有演变为舌尖后卷舌声母。但是我们认为，拟音都是近似，从谐声系统看，日母在中古以前肯定是个鼻音，从泥母[n]到娘母[ŋ]以及疑母[ŋ]之间，属于鼻音的只有[n]和[ŋ]，而[ŋ]与[ɽ]和[l]发音部位相同，可以解释它们的语音历史变化关系，也许日母是率先跨出其系统的声母。否则，我们只好采用高本汉的拟音nɰ。

<sup>③</sup> 关于《切韵》的日元音值，高本汉拟为鼻音与浊擦音的结合体：nɰ，王力《汉语史稿》与后来的《汉语语音史》和《汉语音韵》表述均不同。《汉语史稿》描写其音变轨迹为：n（上古）→nɰ（中古）→ɰ（元明至今）。《汉语语音史》则描写为：n（上古至隋唐）→r或ɽ（晚唐至今）。

的自成音节)，是这种语音的遗留。宋元之后 [l] 进一步发展则为 [z]，不卷舌则为 [z̥]，如甘肃武山和陕西商县张家塬地区“儿”字仍读 [z̥ ɿ]。

根据《蒙古秘史》等元明时期的蒙汉对音材料，表示声母 r 和 l 的文字常常可以互用，尤其是 ri 的音节，或用日母字“而儿尔”，或用来母的“里力黎”，这种混用表明当时读日母的“儿”与读来母的“黎”有近似之音。但两者又有区别，当辅音 r 自成音节或处于一个词的音节之后时，其对应的汉字一般是“儿”；当 r 带有元音处于一个词音节中间时，一般用来母字注音，但其旁必加注一小字“舌”，表明这一个字在来母读音的基础上要变读为日母的字。例如，在《蒙古秘史》中，表示变格后缀的词 dur、tur 等，一律译为“都儿”“秃儿”等。又如下面的例子：

兀儿——ni ur(面 104) 只兀儿——ji ür(翅 212) 阿兀儿——aur(怒 139)  
帖舌里兀——teri ü(头 254) 中合舌里兀——qari u(回 227) 者额儿迭——j ärde(赤马 255) 失兀迭舌里——si üderi(露 105)<sup>①</sup>

又如《华夷译语》：

门都儿——mündür(雹) 中合札儿——qajar(地) 纳兀儿——naqur(湖) 腾吉舌里——tegri(天) 塔舌里颜——tari yan(田) 古舌里延——huri yen(圈子) 帖儿格兀儿——terhehur(大道) 石兀迭舌邻——si üderin(露)<sup>②</sup>

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说明，“儿”的声母读音与来母[l]一定有相似之处，在元代北方官话区正处于[ɾi]或[li]向[z̥ɿ]过渡的时期；并且，作为音节中间或音节末尾的“儿”字韵母（主要元音）与加注“舌”字的“里”（ri）或许有细微的差别，尤其是尾音的“儿”（-r）与我们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儿化韵”的形成有无影响，当引起我们的深思。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元代“儿”音史时必须加以留意的地方。

《中原音韵》产生了新的韵部支思韵，一般认为其韵母为[i]（ɿ, ʅ）。“儿”在支思韵，因此，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其音读为[z̥ɿ]。<sup>③</sup>ɿ和ʅ都是洪音，在舌尖浊擦音的作用下容易产生音位变体ə（e、u、ɛ、ɐ等都可以成为它的音位变体）。这点

<sup>①</sup> 以上例子及其拟音取自昂奇《对元代蒙古口语语音的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括号里面的文字表示蒙文意义，数字为《蒙古秘史》总译的段节数。“合”字前小注“中”字者为喉音标记，《华夷译语凡例》：“字傍小注中字者，乃喉内音也。”又：“字傍小注舌字者，乃舌头音也。”这个“舌头音”在当时可能还不是[z̥]音状态。

<sup>②</sup> 以上例子的拟音取自贾敬颜、朱凤《蒙古译语、女真译语合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27页。按，《华夷译语》与《蒙古秘史》的汉译往往有相异之处，如最后一例“露”的蒙汉对音即如此。它们的汉译虽在明初，但使用的是蒙元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

<sup>③</sup> 关于宋元时期的日母及其儿音的拟音，本人原则上接受王力先生的看法，日元音值为[ɾ]而非[z̥]，这里姑且采用比较通行的说法。

完全可以从现代汉语方言中得到印证，在很多地区方言的儿化词中，当儿尾前的韵母为 $\imath$ 和 $\eta$ 的音节时，则变成 $\text{ə}\imath$ 或 $\text{ər}$ 等形式，如：

河北安国话：写字儿 $[\text{si}\epsilon^{213}\text{tsər}^{51-213}]$ ；

井陘话：写字兒 $[\text{ei}\gamma^{35}\text{tsə}\imath^{51}]$ ；

蔚县话：写字兒 $[\text{ei}\gamma^{55}\text{tsə}\imath^{13}]$ ；

如果保留 $\imath$ 和 $\eta$ 时，儿尾则必须独立成音节，如迁安话：写字儿 $[\text{ei}\epsilon^{214-21}\text{ts}\imath\text{əu}^{51}]$ 。

①实际上从发音原理上说， $[\text{z}\imath]$ 是个很难发的音节，现代汉语普通话这个音节中只有一个“日”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②当 $[\text{z}\imath]$ 发音时，必须发出一个近似“则”的音才能够比较顺畅，也就是说它的元音音值实际上是一个近似 $\text{ə}$ 的混浊元音。③如果说，《中原音韵》“儿”音是 $[\text{z}\imath]$ 的话，也只是维持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就被 $\text{ə}$ 元音扩张而发生“讹变”，大致在元明以后的中原官话区，“儿”字语音的声母开始弱化，声母脱落后成零声母状态。当“儿”音脱落声母以后，由于没有声母的约束，它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然而， $[\imath]$ 是难以单独发音的，要表现它的存在就必须转换它的身份标志，也就是说改变它的读音，于是才有了 $\text{ə}$ 或 $\text{e}$ 、 $\text{u}$ 、 $\text{ɛ}$ 、乃至 $\text{u}$ 的元音变体系列，由于它脱胎于卷舌声母，在它分离过程中必然还会带着卷舌音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西儒耳目资》有 $\text{u}\imath$ 或 $\text{ə}\imath$ 的语音存在， $\imath$ 与 $\text{r}$ 都是卷舌音，同位互转，因此， $\text{ə}\imath$ 转变成 $\text{ər}$ 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关于儿音 $\text{ə}\imath$ 或 $\text{ər}$ ，我们还可以提供另外一种音理上的解释， $\imath$ 或 $\text{r}$ 和 $\text{r}$ 都是响音，可自成音节，在它完成这个发音动作之时，就伴有一个模糊的 $\text{ə}$ ，于是就形成了 $\text{ə}\imath$ 或 $\text{ər}$ 这样的音节。④也有学者认为这有可能是自宋金以来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在语言的汉化过程中而产生的语音讹变。⑤ $\text{ər}$ 当时作儿尾时还能自成音节，后来才发展为与前面韵母融合共存的卷舌儿化韵音节，如北京话的“花儿” $[\text{xuar}]$ 。

① 以上例子取自李巧兰《河北方言中的“×—儿”形式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②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text{ri}$ 音节收有“日驹”两个字，后一个为文言词。又《广韵》质韵日小韵也只有5个字：日驹、日驹、日驹、日驹、日驹。

③ 支思韵早期也有可能是一个圆唇的 $[\text{y}]$ ，根据吴棫《韵补》对支思韵的描述，它是一个读似鱼虞的音，因此，笔者颇疑《中原音韵》的支思韵的音值是 $[\text{y}]$ ，而不是 $[\imath]$ 。笔者有相应研究论文《论宋代支思韵的历史演变及其语音性质》，该文曾在2010年第十六届中国音韵学年会（山西太原）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正在发表中。

④关于儿化韵生成的语音机制，薛凤生先生解释为“语音易位”（《国语音系解析》第79页）。不过笔者认为，从语音史的演变出发加以解释可能更富有合理性。例如，根据古畏吾儿蒙古语音材料，类似于 $\text{ri}$ 的音节很容易在声母前衍生一个 $\text{ə}$ 的语音形式。“在蒙古突厥等阿尔泰诸语言中，有以 $\text{r}$ -音起始的词首加上一个元音的习惯。”（亦邻真2004）儿音 $\text{ə}\imath$ 或 $\text{ər}$ 或由此而来。

⑤参见季永海《汉语儿化音的发生与发展—兼与李思敬先生商榷》，《民族语文》1999年第5期



这是儿化音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赣语的儿尾音“仃”，其直接来源则是宋代北方官话区的卷舌边音[l̥i]，由于在赣语中没有卷舌音，因此，它直接变为li或lə，这与赣语的历史形成有关。<sup>①</sup>

因此，现代汉语儿化音可以归结为三大历史派系：鼻音系、边音系和元音系。它们各有不同的历史层次。鼻音系是最古老的层次，边音次之，但其源头可能是闪音ɾi。闪音后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边音化，二是朝着卷舌声母ʒ方向发展，最后随着声母脱落，ə音或相对独立，音位变体有u、ε、a、ai、ei等；或舌位逐渐后移而产生卷舌动作，从而形成了以北京话为代表的所谓儿化韵ər。其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层次可以简略地表述如下。

第一层次鼻音型：ɳie→ɳi→ɳi /ŋ、n （隋唐时期）

第二层次边音型：ɾi→ɾə→l̥ə→l̥i /li （宋金时期）

第三层次ə音扩张型：z̥l̥→z̥ə→əz̥ /əl̥ （元明时期）

第四层次卷舌儿音型：ə→ər （清至现代）

鼻音型的历史层次可以得到现代吴语、粤语乃至越南汉音的证明，边音型层次可以得到杭州话和山东、山西、河南和河北部分地区方言的证明。在浙江吴语区，除杭州以外，“儿”尾均为鼻音型，或ɳi或ɳi，或ŋ或n，唯有杭州儿尾读边音[l̥]。杭州为南宋都城，此边音无疑是宋室南渡从中原移植过来的语音，其底层语音应当是与其它吴语区一样的鼻音，由于北来人口的势众，强大的吴语并没有把它淹没乃至同化。不过，杭州儿尾本为卷舌边音[l̥]，由于吴语中没有卷舌音，故为平舌[l̥]。<sup>②</sup>第三层次应当是元明时期的语音，第四层次则是清代以后的语音。

## 五 现代汉语儿化音的类型分布

从“儿”音史的情况看，现代汉语儿化音在音型结构上至少有五种语音类型：

1. 卷舌元音型儿化音系列ər；
2. 舌面元音型儿化音系列；

<sup>①</sup> 笔者认为，现代赣语的形成包含着三大要素，唐宋时期的古楚语（现代江淮官话是其中重要成分）、北方中原地区官话和吴语。

<sup>②</sup> 关于吴语儿尾鼻音和杭州儿尾边音[l̥]的历史来源问题，很多学者虽然有所解释，但大多语焉不详。如《汉语方言概要》：“浙江有些地方有‘儿’尾，大概是南宋以后受了杭州话的影响。”（第97页）这里混淆了吴语儿尾音的本末关系。郑张尚芳则曰：“有人曾推测浙江方言的儿尾‘大概是南宋以后受了杭州话影响’而产生的。依我们看，倒很可能是杭州话本来的[n]尾受了北方方音的影响变成[l̥]尾。”（《温州方言的儿尾语音变化（一）》，《方言》1980年第4期）但问题是，为什么[n]尾受了北方方音的影响就会变成[l̥]尾？是杭州人[n]和[l̥]不分？不是。合理的解释就是其前身是卷舌边音[l̥]，而杭州话没有卷舌音，才如此。

3. 鼻音型儿化音系列;
4. 边音型儿化音系列;
5. 舌尖浊擦音儿化音系列。

在讨论汉语方言儿化音的类型分布问题之前，先介绍一些相关研究。本文研究基本完稿以后，调查相关文献，惊讶地发现与有自己类似的研究成果。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国学者莫景西（A·MONASTYRSKI 此问题也早有研究，所分五种类型与本人研究不谋而合，论文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上，题曰《“儿化”、“儿尾”的分类和分区初探》。可惜此文未能引起国内研究方言的学者注意，在讨论儿化音的类型时沿用的还是旧的说法。但该文也有不足之处，没有对儿化音的历史层次加以研究，在说明儿化音的类型时，举例有不恰当之处，如在说明元音类型儿化音时，所举南昌话儿尾[ə]为例不确。南昌话儿尾为[li]，所举“猫儿”读[ə]为特殊例子，南昌话今读[mau·ni]（有可能是爱称“猫女”音读），除此以外，绝大多数儿尾词读[li]，轻声。

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王福堂先生的《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一书（1999年语文出版社），原书第六章《儿化韵》所言儿化音在音型结构上的五种语音类型也已导乎先路。但王先生似乎没有讨论儿化音的历史层次问题，所言“儿化韵”的分布地区有三：（1）官话方言区，（2）相连的吴方言、徽方言和赣方言地区，（3）粤方言区。所谓赣方言区的儿化韵盖意指与徽语区“相连”的赣东北地区的玉山、浮梁等县鼻音形态的-n尾儿化韵，但举例甚少，文中仅列举了余干和都昌方言女儿的一个儿化韵的例子，而关于“仃”是否为儿化韵问题则未能涉及。<sup>①</sup>

以上研究虽先得于心，但在赣语儿尾问题上仍有研究不足的地方。因此，本文有必要阐释自己的看法及其研究成果。

#### 1. 卷舌元音型儿化音系列 əɾ。

又可以分为自成音节和不能自成音节的两种。自成音节的如河北易县“豆儿”[təu əɾ]；不能自成音节的如北京话“小屋儿”[ɕiəu ur]，这是 əɾ 音的进一步发展。其发展的轨迹仍然可以从一些官话方言中观察出来，其初它既可自成音节，又可同时与前面韵母发生融合关系而改变原有的韵母结构，如湖南永顺方言（属西南官话区）儿化后吞没前面的韵母，仅保留其介音及其声母，故其儿化韵母有固定的四个：-əɾ、-iəɾ、-uəɾ、-yəɾ。<sup>②</sup>有的则根据前一个音节尾音情况而形成新的儿化音节，如湖南安乡话“狗儿”[kou ŋəɾ]。<sup>③</sup>不过，在有些官话区，具有卷舌性质的-r音有消失的趋势，如云南滇南地区方言，“沙梨儿”：liəɾ→liə。老官儿：kuəɾ→kuə。<sup>④</sup>

<sup>①</sup> 以上内容均为拙文原稿后记部分，今修改时以示尊重，移入正文。

<sup>②</sup> 参见李启群《湖南永顺方言中的儿化》，《吉首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sup>③</sup> 参见应雨田《湖南安乡方言的儿化》，《方言》1990年第1期。

<sup>④</sup> 参见陈叟《滇南方言的儿化音变》，《红河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并参见同期学报署

## 2. 舌面元音型儿化音系列。

“儿”字读音零声母化是官话方言的一大特点，除卷舌元音  $\text{ər}$  外，很多方言点为舌面元音，主要有  $\text{ə}$ 、 $\text{ɤ}$ 、 $\text{ɛ}$ 、 $\text{a}$ 、 $\text{ai}$ 、 $\text{ei}$ 、 $\text{ɬɤ}$ （陕西神木）等，没有卷舌动作。作儿尾时，一般可自成音节，如甘肃兰州话“儿”读  $[\text{ɤ}]$ ，作儿尾读音亦如此；河南西南部大部分方言点如洛阳、孟津、西峡、浙江等“儿”字及儿化音亦作  $[\text{ɤ}]$ 。又青海西宁方言儿尾作  $[\text{ɛ}]$ ，自成音节。湖北鄂州方言作  $[\text{a}]$ ，山西清徐话为  $[\text{ai}]$ ，文水县方言作  $[\text{e}]$ ，<sup>①</sup>等等。有的受前面韵母影响而往往产生音变现象，情况较复杂。如河北青龙地区，“牛儿”读  $\text{ni ou}35 \text{ uə}$ ，“羊儿”念  $\text{i aŋ}35 \text{ ŋə}$ 。<sup>②</sup>梅县客家方言儿尾读  $[\text{e}]$ （有人记作  $\text{ei}$ ），但在前一个韵母的尾音之后也会产生相应的音韵变化，例如前面韵母收音为  $-\text{m}$ 、 $-\text{n}$ 、 $-\text{ŋ}$ 、 $-\text{p}$ ，则变成相应的  $\text{me}$ 、 $\text{ne}$ 、 $\text{ŋe}$ 、 $\text{pe}$  等音节，如“凳儿”： $\text{ten} \text{ŋ} \text{ ne}$ ，帽儿： $\text{mau} \text{ŋ} \text{ ve}$ 。<sup>③</sup>

## 3. 鼻音型儿化音系列。

典型的是浙江地区方言，据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南部吴语“儿”音一般读  $[\text{nie}]$ 、 $[\text{ni}]$ 、 $[\text{ni}]$ 、 $[\text{n}]$ 、 $[\text{ŋ}]$ ，自成音节，附在本音（本词）后面充当词尾（原书第136页）。如义乌、浦江一带读  $[\text{n}]$ ，缙云读  $[\text{ni}]$ ，云和读  $[\text{ni}]$ ，温州话儿化后其音为  $\text{ŋ}$ ，如“毗牙儿”念成  $[\text{dz} \text{ŋ}^\circ \text{ŋo} \text{ŋ}]$ 。<sup>④</sup>此外，客家方言和粤语地区也以鼻音为主，如广西贺州地区为  $[\text{ni}]$ ，广西容县“猫公儿”尾音  $[\text{ni}^{51}]$ ，广东信宜“猪儿”  $[\text{ŋi}^{53}]$ 。<sup>⑤</sup>

## 4. 边音型儿化音系列。

有卷舌和不卷舌之分。卷舌边音主要分布在官话区，如山东鲁中淄川、寿光北部、莱芜地区等，这些地区“儿”字及儿化音均读  $[\text{ɻ}]$ 。<sup>⑥</sup>据李巧兰调查，河北省至少有二十个县市儿尾为卷舌边音型，如井陘、深州、赵县等地方言即是如此，或  $[\text{l}]$ 、或为  $\text{ə}[\text{l}]$ ，或为  $[\text{lə}]$  等。<sup>⑦</sup>河南泌阳话儿尾也是  $[\text{l}]$ ，多读为闪音，韵母多达16个，如“堆儿”： $\text{tə}[\text{l}]$ 。<sup>⑧</sup>另外，西南官话中的遵义地区也是卷舌边音，但  $[\text{l}]$  一般做韵尾，有儿化

---

名文章《临沧地区方言儿化韵和合成词初探》（作者：敖秀藩）。

<sup>①</sup> 参见沈明《山西方言的小称》，《方言》2003年第4期。

<sup>②</sup> 参见张世方《从周边方言看北京儿化韵的形成与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sup>③</sup> 参见黄雪贞《梅县客家话的语音特点》，《方言》1992年第4期。

<sup>④</sup> 以上并参见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等文，《方言》1980.4/1981.1。

<sup>⑤</sup> 参见陈小燕《广西贺州本地话的“儿”尾——兼论粤语小称形式的发展和演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按，叶国泉、唐志忠《信宜方言的音变》（《方言》1982.1）“猪儿”记作  $[\text{niŋ}]$ ，可参。

<sup>⑥</sup> 参见亓海峰、曾晓渝《莱芜方言儿化韵初探》，《语言科学》2008年第4期。

<sup>⑦</sup> 参见李巧兰《河北方言中的“×—儿”形式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sup>⑧</sup> 参见李宇明《泌阳方言的儿化及儿化闪音》，《方言》1996年第4期。

音变现象，情况比较复杂，有  $\text{ɿ}$ 、 $\text{iɿ}$ 、 $\text{uɿ}$ 、 $\text{yɿ}$ 、 $\text{æɿ}$ 、 $\text{iæɿ}$ 、 $\text{uæɿ}$ 、 $\text{yæɿ}$  等多种形式。<sup>①</sup>不卷舌边音儿化音主要分布在赣语地区、杭州地区以及广东五华客家方言等，这些地区的语音系统往往没有卷舌音声母，故如此。属于这一系列还有安徽宿松方言，“儿”字读舌尖后边音  $[\text{ʅ}]$ ，作儿尾时自成音节，如“马儿”“羊儿”“猪儿”之类均读为  $[\text{ʅ}35]$ 。<sup>②</sup>此外还有山西晋语区的岚县、祁县、武乡方言，其儿尾读音也是如此，边音声母自成音节；兴县则为  $[\text{lə}]$ ，后面带有元音  $[\text{ə}]$ 。<sup>③</sup>重庆儿化音有文白二读，文读为  $[\text{ər}]$ ，白读为  $[\text{lə}]$ ，郊区和老年人一般为白读。<sup>④</sup>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儿化音的历史发展及其历史底层问题。

#### 5. 舌尖浊擦音儿化音系列。

在这些地区，“儿”字声母一般读  $[\text{z}]$  或  $[\text{ʅ}]$ ，如江苏丹阳和湖北阳新“儿”读  $[\text{z}]$ ，甘肃武山、甘谷一带则把儿尾念成  $[\text{z}]$ ，自成音节，如“刀儿” $[\text{təu} \cdot \text{z}]$ 。舌尖后浊擦音  $\text{ʅ}$  见于山西平遥方言，儿尾读  $[\text{ʅ}ʔ]$ ，带喉塞音，阴入，与本地“热”字同音，如“锥儿” $[\text{tsuei} \text{ʅ}ʔ]$ 。另外山西岚县儿尾重读时，声母也读  $[\text{z}]$ ，儿尾读  $[\text{z}ʔ]$ ，如“猪儿” $[\text{tsu} \text{z}ʔ]$ 。据高本汉调查，民国初安徽凤台话“儿”字也读  $[\text{z} \text{ʅ}]$ 。

以上纯粹是从“儿”作名词词尾的音型结构分析着手而归类的，它既有历时音变，又有共时音变。鲁允中先生将儿化音分为自成音节、不能自成音节和附着于韵尾后起卷舌作用三种，这只是功能归类而不是语音归类。赵元任先生以现代  $\text{ər}$  音为范围，认为其来源于方位词“里”、时间词“日”和名物词尾的儿 ( $\text{ər}$ )，李思敬先生则补充了京东话时态助词“了”读“儿” ( $\text{ə}$ ) 音而成四个来源。我们认为，这些“来源”只能说明  $\text{ər}$  音的语法功能扩大，无法解释“儿”音史及其音变类型问题。“这里”与“这儿”，“今日”与“今儿”，它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至于京东话“心里就象开儿锅似的”，将“了”念成“儿”，只是地方音变，更不属于名词“儿尾”意义上的儿化音，把它说成“来源”云云是不恰当的。在此，本文有必要加以辨正。

## 六 结语

本文讨论了“儿”的语音史问题以及在现代南北方言中的儿化音形式，从其类

<sup>①</sup> 参见胡光斌《遵义方言的儿化尾》，《方言》1994年第1期。

<sup>②</sup> 参见唐爱华《宿松方言研究》，第1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

<sup>③</sup> 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有：乔全生《山西方言的“儿化、儿尾”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沈明《山西方言的小称》（《方言》2003年第4期），高永鑫《山西祁县话的儿尾》（《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下文所言晋语方言特点参考文献同此。

<sup>④</sup> 参见徐海英《重庆话的儿尾》，《重庆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型分布中，可以看出赣方言的儿化词尾“仃”无疑属于方言学上的“儿尾”词，属边音型儿化音系列，在南北方言中都有它的“姊妹”存在，因此，它决不是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另类。正是从这些“姊妹”关系中，我们可以考察它的历史层次。沿着杭州话儿化音的边音线索，并参考其它官话方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它是宋代官话“儿”音的遗迹。

这个结论不仅仅是来自方言的历史比较，还有历史移民及其赣方言形成的历史研究。篇幅所及，将另文讨论。

或疑曰：赣方言中古日母三等字声母为n，而本文将“仃”看成“儿”音，声母为来母，何以如此？其实，从上述列举的各地方言儿尾音的语音形态看，并不难理解。儿化音是个比较特殊的音，一旦形成后便具有自己独立的语音形态，它与“儿而尔二”等系列字及其它日母字的语音发展并不平行，无论在声母和韵母上都是如此。赣方言儿尾“仃”是一个历史语音的沉积，只是时间久了，语音形态固定下来，身份隐蔽，人们不易察觉而已。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9月。
- 陈昌仪《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
- 《江西省方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6月。
- 黄雪贞《梅县客家话的语音特点》，《方言》1992年第4期。
- 李巧兰《河北方言中的“×—儿”形式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 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
- 李思敬《汉语“儿”[ɛ]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
- 鲁允中《轻声和儿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
- 莫景西《“儿化”、“儿尾”的分类和分区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 乔全生《山西方言“儿化、儿尾”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年。
- 谢留文《南昌县蒋巷方言的“子”尾和“里”尾》，《方言》1991年第2期。
- 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
- 徐海英《重庆话的儿尾》，《重庆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 薛凤生《国语音系解析》，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9月。
- 亦邻真《元代汉字译写蒙古语音的惯例》，《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1期。
-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第二版）。
- 赵日新《徽语的小称音变和儿化音变》，《方言》1999年第2期。
-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